

费孝通全集

第十三卷
(1988-199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费孝通全集

第十三卷
(1988-199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费孝通全集·第13卷,1988~1991/费孝通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3

ISBN 978-7-204-09796-8

I. 费… II. 费… III. 费孝通(1910~2005)—全集 IV.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3232号

费孝通全集

费孝通 著

责任编辑 王东生 王占英 王继雄

责任校对 县翔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292

字数 7025千字

版次 2009年10月第一版

印次 2010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套

书号 ISBN 978-7-204-09796-8/C·211

定价 880.00元(全20卷)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1989 年费孝通接受香港大学授予的文学博士学位

本卷说明

本卷收录了作者 1988 年至 1991 年间所撰写的文章。这段时间，作者一方面继续关注小城镇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将更多的精力用于西部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调查。发表了《话说呼伦贝尔森林》、《甘肃行》、《凉山行》等文章，特别是在《凉山行》一文中提出了关于大西南的“一点、一线、一面”的开发设想，受到了有关方面的极大重视。

在此期间，作者还写就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先在香港大学的泰纳讲座作了宣讲，后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本卷的文章一般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为读者阅读方便，我们将同一课题的文章予以适当集中。在编校上，除对个别明显的排印上的错失予以纠正外，其余一律存其旧貌。

目 录

龙年献词	(1)
《费孝通学术精华自选集》自序	(6)
旧燕归来	(10)
清水人形	(14)
其报其人	(18)
《外访杂写》前言	(21)
席间谈絮所引起的	(26)
学历简述	(30)
话说呼伦贝尔森林	(38)
全国一盘棋	(50)
一代良师	(58)
论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	(61)
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66)
压力·时机·对策	(71)
泡桐花开	(84)
访骆驼之乡	(88)
发挥民族优势脱贫致富	(98)
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	(104)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109)
保安三庄	(148)
茶叙答问	(150)
民盟要为加快民主进程出力	(156)

团结起来,开拓前进	(163)
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	(165)
谈多党合作	(168)
南岭行	(173)
教育是为了提高人的素质	(181)
办实事,做好事,做有益于人民的事	(186)
从私交到公关	(190)
答问发展与发展研究	(197)
异军突起的中国乡镇企业	(206)
四年思路回顾	(209)
几点看法	(248)
从小培养二十一世纪的人	(251)
宝鸡讲话	(262)
秦淮风味小吃	(270)
八十“三问”	(276)
同唱一台戏 和衷渡难关	(278)
甘肃行	(282)
缅怀福武直先生	(298)
农业现代化与深化改革	(301)
良好的范例	(310)
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初步设想	(312)
开发大西北	(314)
中华民族研究的新探索	(321)
长江三角洲之行	(326)
人的研究在中国	(340)
认清形势,做好民盟的工作	(350)
结合实际 修正认识	(353)
近水楼台先得月	(361)

重访云南三村	(366)
红场小记	(381)
在人生的天平上	(385)
我们该怎么做	(391)
肺腑之味	(394)
榕城佛跳墙	(399)
几点意见	(404)
乡镇企业向前看	(407)
包头行	(414)
应该说是有点缘分	(422)
风雨同舟五十年	(425)
江苏乡镇企业的下一步	(436)
吴江行	(441)
无棣金丝枣	(457)
侨乡行	(461)
凉山行	(469)
志在富民	(483)
清华人的一代风骚	(492)
在湘鄂川黔毗邻地区民委协作会第四届年会上的讲话	(505)
《城乡协调发展研究》后记	(519)
关于内蒙古经济发展的一些意见	(538)
乡土教材和社会调查	(542)
《行行重行行》前言	(546)
武陵行	(550)

龙 年 献 词

首先让我代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向各位领导、各位同志拜一个年。在庆贺中共十三大胜利召开之后不久，接着又来迎接 1988 年的开始，满怀希望的愉快心情，我们大家是一样的，这些无须我多说。请容许我在新的一年的开始，和同志们谈谈心，说一说我这些日子里心中常在盘算的一个问题，一个在开放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就是地区性先富后富的问题，也就是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在发展上出现的差距问题。让我先把问题提出来，再说说我对逐步缩短差距的战略考虑。我想用探索思考的砖来敲开这龙年的大门。

我在过去的一年里，东西穿梭，南北来回，奔走了 148 天。眼看到全国各地农村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实在引人入胜。农村经济的发展中我特别关心的是乡镇企业的兴起。事实是令人兴奋的。去年 1987 年全国乡镇企业的产值高达 4500 亿元，占全国社会总产值 1/4，第一次超过了农业的总产值。

乡镇企业为我们国家创造了这样大的财富，怎么来的呢？最简单地说是出于农业体制改革，在农村里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把长久窝在大锅饭里的大量农村劳动力解放了出来，通过乡镇企业变成了生产力。在过去 9 年里从农业里全部或部分转移到非农岗位上的农民有 8500 万人。就是这些劳动力创造了 4500 亿元的财富。乡镇企业是农民用自己的积蓄办起来的，是农业里长出来的工业，是我们广大农民为我们祖国的产业革命找出了一条世无前例的新路子。中国如果不走社会主义道

路，不进行改革开放，这种异军突起的历史奇迹是不可能出现的。

这9年里我国的农村经济确是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这句话适用于全国各地。但是前进的步伐各地不同。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山东半岛的沿海，以及像浙江的温州、天津的大邱庄那些据点，形成了我国当前沿海一串光辉的明珠。这些地方离小康水平已经不远了。它们的特点是乡镇企业在它们的经济结构里已取得压倒优势的地位，工农在产值上的比例平均已超过8:2。它们已经从农业里转移出80%到90%的劳动力。它们给了我们一定会繁荣富强的信心，也做出了脱贫致富的生动范例，引起了全世界有识之士的重视。

但是到目前能达到这样水平的地方还不多。从全国来看，经济发展的水平上已出现了明显的梯度曲线，越向西走，水平越低，其中还存在着许多贫困的孤岛和边角，就是温饱问题还有待解决的老少边区。这些地区经常引起我的焦虑。怎样缩短地区性经济差距也成了我这几年来给自己提出的研究课题。

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说，不平衡是常态。个人也好，地区也好，有的先富，有的后富。这个规律必须承认。过去我们在平均主义的思想下，曾经想用行政手段进行平调，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大家贫困。我们千万不能忘记这个教训。但是同时要记住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容许贫富两极化，全民共同繁荣是我们的目的。因之，在先富后富的发展过程中要采取适当的措施控制地区差距的不断扩大，不是截长补短，而是助短成长。

我们的党和政府对中西部的发展一直是关心和重视的。对财政上有困难的边区各省及自治区一直采取补贴政策，对老少边区设立了扶贫机构和拨给专款，这些措施取得的成效必须肯定。但是只靠这些办法来缩短地区差距看来是不够的。还有什

么办法可以加速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呢？

我在沿海地区的调查访问中得到的启发是：乡镇企业这支异军之所以能突起，主要是在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乡镇企业不是上面想出来的，它是贫困的农民在艰苦的环境下自己搞起来的。它的初期曾受尽抑制，到 1984 年才取得合法地位。1985 年是个好年头，1986 年又受到宏观控制，许多刚冒头的地区就被压住了。接着这一两年里过去的许多优惠待遇逐一取消。它们一面要和国营企业一样纳税，但得不到平价的原材料和能源的供应，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却要 and 国营企业在同一市场上竞争，另一方面还要负担大部分的乡镇财政和建设费用，连参军和独生子女的补贴都得由它们开支。尽管这样，靠我们农民兄弟姐妹的勤劳刻苦，不但撑住了这些没有用国家一分钱创立起来的企业，而且还能以接近 30% 的速率增长。这说明了一旦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了起来，找到了一条活路，他们是能坚持、能发展的。要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必须要使他们在这些活路上得到切身的实惠。我这一点体会使我想到，中西部发展较缓的因素固然很多，其中经常被忽视的，但可能是关键所在的，也许就是人的因素，包括基层干部在内的群众生产积极性。我因之推想，如能在这方面进行检讨，也许可以找出一些有效的新路子。

我们必须承认，国家对中西部的发展，特别是西部，过去所说的“三线”，投下的资金是不少的。可惜的是这笔巨额投资并没有取得应有的经济效益。目前我们还继续在财政上对这个地区进行的补贴为额不小，累积的总数更大。但是经济效益不显著。在这里我首先想到的问题是，这笔财力使用得是否得当？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先得把支援和救济这两件事在概念上区分清楚。对人们的正常生活都不能维持的地区进行救济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但一旦温饱解决之后，先进帮后进的方式

应当是支援而不是救济。救济是提供生活必需品，支援是提供生产条件。如果送入后进地区的款子大量花在非生产性的项目和行政开支上，结果很难避免助长基层干部甚至群众的依赖性，即所谓“共产党不会让我们饿死的”那种失去自力更生的消极态度，而且容易引起行政机构的过分膨胀，使许多有用的人才埋在文山会海中削弱行政效率。

我上面所表达的这番话可能由于我的焦虑而说过了一点头。我得承认我的观察不全面，考虑也不切实，还不能深刻体谅中西部地区的苦衷，但是提出来说一说我想是有点好处的。如果确是存在着这些倾向，有则改之，实际上并没有这些倾向，或没有那么严重则可以闻者作戒，无则加勉。

如果多少有这些倾向的话，应当怎么办呢？我认为首先要肯定先进帮后进，共同繁荣的原则。先进地方要顾全大局，乐于把帮助后进作为自己应尽的责任，不要说“鞭打快马”。要明白中部的粮食，西部的能源和中西部地下所蕴藏的自然资源是沿海地区进一步发展最可靠和最巨大的依靠力量。这方面存在着两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要保证先进地区所做出的贡献发生经济效益。二是这个支援后进地区的责任在各先进地区间应有个公平的安排，量力出力，使得这项义务不成为拖住先进地区继续发展的包袱。

在这一点上我希望中央和地方能共同研究当前的财政补贴制度。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在保证历来受国家补贴的地区继续受惠的原则下，逐步从救济性质转变为支援性质，建立发展生产基金。那就是说在原来的补贴定额中有计划地逐年划出一部分作为该地区发展生产的资金，用无利或低利贷款方式去落实能使千家万户得到实惠的建设项目。这笔生产基金如果能管理好，本身不会消蚀，而且能逐年增长壮大，成为充实这些地区地方经济的实力。由于生产事业的发展，许多现在拥挤

在行政机构里的人才也可以解放出来发挥他们的才能，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从沿海发达地区的经验来看，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必都依靠国家拨款。所以中西部的眼光也必须从向上转向发达地区去打主意。那就是要尽可能开辟和疏通民间渠道，即现在所说的横向联系，采取多种方式从发达地区引进技术、资金，建设本地区的乡镇企业。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可以到中西部通过联营设厂办企业，利用当地能源和劳力，开发当地资源，在当地生产成本较低的优质商品，打开国内外市场，带动中西部的经济发展。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制定一系列政策来改变当前不仅人才和活力甚至资金从中西部外流的趋势。中西部必须有开放的决心，破除封锁局面、保护落后等狭隘的地方观念，积极吸引技术和资金的进入。我们也应当发动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大家出力支边，开辟和沟通中西部和沿海地区交流的渠道，搭桥联系，为中西部早日赶上沿海地区，实现全国共同繁荣的局面而出力。

最后让我再一次向大家祝贺新年愉快，万事如意。我是个书生，就以此一纸人情作为献给这几年来给我深刻教育的各地农民父老兄弟们的年礼。

1988年1月1日

《费孝通学术精华自选集》自序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要我自选一些发表过的学术文章编成一集，收入他们出版的《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名家自选学术精华》丛书。我受宠若惊，不敢承允。我固然写过不少文章，也自认为是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人，但是“当代名家”的称号实在当不起。我的作品内容很杂，挑来挑去也选不出可称得“精华”之作。这点自知之明，我是有的，原不应滥竽充数。但还是拗不过出版社执意之约，多次辞谢不果。编成之后，心里还是不安，想在书前略表衷思。

为了要我自选，我不得不把曾发表过的作品，凡是手边能找到的，翻阅一遍。我看到我写作的时期实在不短，前后已有64年。最早的作品是1924年发表在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少年》杂志的《少年文艺》，后来还写过一些童话。我又看到我虽没有走上文艺这条路，但早年的写作却培养了我写杂文的爱好。

1930年我才进入社会科学的园地。可是我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安心在划定的学科的范围里活动。按传统的学术分科来说，我是脚踏了两条船，一是所谓社会学，一是所谓人类学。人类学实际上已越出了所谓社会科学的界限。我不管这一套，认菩萨不认庙。我这50多年来认定一个主要课题，就是认识中国社会情况。这个“越界”问题在国内并没有引起什么麻烦，在10年前曾有一段时期反正都是一窝里的货，全被端走了。最近这些学科恢复了名誉，界线何在颇费周章。

有些出版社想出版我的文集，由于跨界，只能把我的作品掰成两半，一属东家，一属西家。一家出了我的《民族研究文集》，另一家出了我的《社会学文集》，使我很为难。这本书以社会科学为范围，免遭此劫。

但是问题还是有。我这些作品里哪些够得上“学术”的规格？在当前我们这个什么都要讲“规格”的社会里，这个问题要丢都不易丢得开。我所发表过的文章里有不少是社会调查。社会调查算不算学术论文想不到曾经成为一个有争论的问题。甚至有一家自称是社会科学的专门杂志认为，社会调查“没有理论”，不应闯进“学术”的堂奥。幸亏我老了，不求什么职称，否则我也就会轮不到提升了。

其实怀疑我那些作品能不能进学术庙堂的，并非今日始有。原因是像我这样“做学问”的人在中国历来是不多的。一不善于引经据典，排列数字，二没有深奥难懂的行话专词，三不说教立说。我主张要写看得到的事实，多想想这些事实的意义，有什么体会就说什么体会。所以我下笔不讲求形式，也不愿受格律限制。这些使道貌岸然的学者看不入眼是可以理解的。

我那种有话就写，即兴成章的习惯当然有它的缺点。没有经过反复考虑的思想，总容易有片面、失实，甚至错误的地方。但这已成了我的积疾，几十年来还是难改。这种习惯很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形成了我写作的风格。说是和性格有关，因为我记得在小学里，为了考试时抢交头卷，常看到老师对我无可奈何地摇头。交头卷有什么好，自己也不明白，但只要看见有人在我前面交了卷，我就急了，从来就是个宁可少得分数，也捺不住多看几遍，改正些错字。不仅幼年如此，到了中年，听到人家说我“快手”，心里就得意。我也明白这不一定是褒词，快不一定好，甚至一定会在好字上打折扣。但积重难

返，老来还是没有耐心，不写手痒。

我说这段话，是想为我只能写短文，长篇写不好的风格找个理由。我回头看我所发表的作品，除了几本调查报告外，没有写过大部头的书。即使像《生育制度》、《乡土中国》这类需要较长篇幅才能把自己思想发挥清楚的书，我也是长篇短写，分成许多小题目，一篇一篇地写成的，有点像现在电视里流行的连续剧。至于访问记一类的作品，更是如此了。甚至近年来有关小城镇和边区开发的研究还是采取了系列化的形式来发表的。我写文章已习惯于一气呵成，过去年轻时是文章不过夜的。这样写，也有好处，文思连贯，笔调畅顺，坏处就是难于周到求全，失之于偏畸。

养成这种习惯也有我处境的客观条件。我写作旺盛时期是在30岁前后，正是抗战年头。那时我在后方云南昆明，一面在学校里教书，另一面由于收入太少不够养家，不能不另谋第二职业。而我除了一支秃笔之外，并无所长。所以从40年代开始，直到解放，我不能不靠卖文为生。我不会写小说，只能写短文过日子。最困难时，我在云大校门口的茶馆里摆过摊子，等人来约稿。昆明报纸是我的顾客。我只把住一条，按自己要说的话写，愿买者不拒，稿出不留底，很多不具名，现在已难收集了。

我又和若干刊物有长期供稿的特约。比如，从1947年起，《观察》几乎每期有我的文章。那时伦敦援华会的朋友每周寄我重要报刊的航空版。我掌握的信息比别人灵快，每周写不署名的译稿，反映国际舆论。还写过《炉边天下》，引起国际新闻界的注意，称我作中国的专栏作家。其实这只是我的副业。当时我除了需要稿费补贴家用外，我也发生了政治上的兴趣，因而得到了“民主教授”的称号。我这里要问的，这些算不算学术文章呢？答案并不那么容易。如果不算，那么我的

“中国士绅”那一系列文章，经人翻成英文，至今在国外的某些大学里还在用做课本，这又怎么说呢？如果这一系列算，凭什么说《炉边天下》不算呢？这些还不是当时的国际政治的分析？

话又说回来，我这些作品反正和当时甚至目前被认为是学术论文的是有区别，不仅形式不同，本质也不能一样。究竟应当怎样评估，我想还是留待后人去说的好。我反正已经年迈，要改变已经不容易了。我还是本着说真话，写容易读的东西就是了。我行我素。

本来我可以不必去牵出这些问题来麻烦自己。我的时间已经不够用了，哪里还有工夫去花那些口舌。只是因为要“自选学术精华”，不想明白了，难于取舍。想明白是困难的。我只好这样办：那些我自认为比较写得分量重的调查报告，由于篇幅太长，不合丛书规格，就不去考虑了。还有那些游记体裁的杂写，抒情甚于载道，离一般所谓学术看来是远了些，不妨割爱。这两头一切，留下的我自己看来都是平平的，说是“精华”实在有点寒酸。但是我有什么其他选择呢？既要成全出版社的善意，我只能担当敝帚自珍之嫌了。

当我把这本稿子送出门时，心里并不悻然，总觉得做了件不太惬意的事。就让我把这心情写在纸上来结束这篇前言吧。

1988年1月7日于香山饭店